

直面“孤证”：态度·方法·价值

南志刚

【摘要】“孤证不立”是近现代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然而当代文学史料具有不容忽视的“当代性”。“毛罗对话”、“关于《古船》的指示”、多多的“白洋淀诗歌”与“路遥转让工作名额”事件，均为文学史孤证，却能在史实晦暗难明的情况下，显现历史真相的冰山一角，成为撬动历史真相的第一把“杠杆”，具有不容替代的文学史价值。一条孤证引发证实与证伪的学术讨论，将被埋没的史实钩沉出来，就是孤证的独特价值。“证实”孤证，给还原历史史实以有力的启迪或深刻的暗示，循着孤证线索建立完整的证据链；“证伪”孤证激发人们钩沉历史真相的兴趣，开辟出另一番学术天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应该直面孤证，当孤证尚孤之时，给予孤证足够的尊重和宽容，不能用简单的真假判断将孤证封杀在摇篮里。对待孤证，既要坚持“孤证不立”“孤证不举”的学术规范，亦当充分考虑当代文学当代性、现场感，采取“孤证不废”的策略，建立符合当代文学研究实际的史料学态度与方法。

【关键词】当代文学研究；史料；孤证；态度；价值

【作者简介】南志刚(1964-)，男，陕西渭南人，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E-mail:zhigangnan@126.com(浙江宁波 315211)。

【原文出处】《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0.5.11~17

【基金项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及其主要路径与方法研究”(15AZW009)。

一

“孤证不立”广泛运用于审判、考古、训诂等领域，已成为近现代的一个学术原则。“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多重证据法”，都是强调文献史料的证据链，主张从丰富的文献史料中还原历史的原生态，追求历史叙述的真实性。1904年，梁启超在阐释科学精神时说：“善怀疑，善寻间，不肯妄徇古人之说与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一也；既治一科，则原始要终，纵说横说，务尽其条理，而备其左证，二也；其学之发达，如一有机体，善能增高继长，前人之发明者，启其端绪，虽或有未尽，而能使后人因其所启者而竟其业，三也；善用比较法，臚举多数之异说，而下正确之折衷，四也。”^{[1]P2}在梁启超看来，“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是学术研究的目的性追求；要实现这一目的性要求，不仅需要“原始要终”“纵说

横说”“尽其条理”“备齐左证”，而且需要善于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要辨析“多数之异说”，相互参证，细加考辨，方能得出“正确之折衷”。强调文献史料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追求证据链的完整性，包含了“孤证不立”的思想。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要》提出学术研究必须进行四个步骤，“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反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2]P4}所谓“博求证据”，就是指研究及其历史化，不仅要注意搜集正面证据，同时也要注意搜集旁面和反面的证据。只有如此，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支撑自己的意见，则“泐为定说”。如果遇到有力的反证，则放弃自己的观点，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陈寅恪也强调证据链的完整性对历史叙述的重要价值，他曾用“取地下之文物与纸上之遗文相互释

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旧籍相互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来概括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12]19}。在辩证史学与经学释证史料方法差异时,陈寅恪指出:“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段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阙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证之结论。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又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难。”^{[13]238}陈寅恪批评“夸诞之人”用“单证”附会,得出普遍性结论,而由于证据链不够完整,不易找到反驳之证据。

“史料进入研究视野,必须经得起历史和理性的叩问与筛选”,这种叩问和筛选,既包括“考订真伪”,也包括价值判断,因为“不是所有能见到的史料都可作为探讨规律之用,也不是所有的史料都具有同等的价值”^{[14]11}。叩问和筛选的目的,当然在于重建原生态的历史,回到文献史料所发生的现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充分注意到:“人们查询文献资料,也依据它们自问,人们不仅想了解它们所叙述的事情,也想了解它们讲述的事情是否真实,了解它们凭什么可以这样说。了解这些文献是说真话还是打诳语,是材料丰富,还是毫无价值;是确凿无误,还是已被篡改。”^{[15]6}为此,重建“文献背后的过去”就成为史料学的重要目标。福柯强调文献史料的整体性与关联性,“历史力图在文献自身的构成中确定某些单位、某些整体、某些体系和某种关联”^{[15]7}。

无论是近现代学术先驱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还是西方现代哲人福柯,都强调学术研究中文献史料证据完整性,对孤证保留着近乎严苛的审慎态度。然而,正如陈寅恪对经学研究“材料残阙而又寡少”的忧虑,文史研究也存在“材料残阙而又寡少”的情况。在漫长的历史流变中,有些史实文献记录较多,史料相对“备具”,证据链相对完整;而有些史实

文献记录(包括地下文物)相对较少,甚至极少,能够被挖掘、发现的史料更是少之又少。有一些涉及敏感、隐秘的史实,即使有文献记录,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人为的、非人为的因素,在一定时间内不能见光。有一些史实,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时人没有确凿的文字记录,只能事后凭借记忆,以口述的方式保存在很小的一个圈子内。“书中所看到的只是真实历史过程中的极小的一部分;历史的大部分故事和细节都淹没在人类意识之外的‘一个根本无法去证明什么的’深海之中。”^[16]每一条证据链上的证据,都是由一个一个孤证组成的,离开了单个的、具体的孤证,现代学术知识谱系也就无从谈起。对于当代文学而言,许多史料湮灭在一地鸡毛的纷乱之中,有些史料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无法公之于众,导致诸多重要的历史史实晦暗不明。当此之时,一条孤证,即使有记忆误差、记录模糊,甚至有时间错误的误证,也能够开启一线光亮,引导、激发人们探寻历史真相。因此,在当代文学学科尚不成熟的阶段,孤证具有特殊的价值,通过对孤证的考辨、补证、质疑、充实,建立史实的证据链,还原尚处于晦涩幽深中的历史现场。在这方面,“毛罗对话”及其讨论,就是一个可待分析的例证。

二

“新世纪伊始,我国文化界最热门话题之一,就是关于‘1957年毛罗对话’的论辩。”^[17]从2001年到2017年,“毛罗对话”作为一条被“转述”的孤证,引发了学者对现当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等史料进行深层发掘与各具特色的阐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立足文献史料学的基本原理,参照近现代学术中“孤证不立”的规范,结合当代文学的特殊及复杂情况,拟对此展开探讨,以便对孤证之在当代文学研究的独特价值有所认识。

2001年9月,周海婴在《鲁迅与我70年》中首次披露“毛罗对话”：“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

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18]370-371}不久,“孤证”提供人贺圣谟发文确认他向周海婴转述了罗稷南“口述”^[9-10]。紧接着,还有陈焜和黄宗英等,也撰文发声“证实”^[11-13]。从周海婴、贺圣谟,到陈焜、黄宗英,“毛罗对话”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影响这种变化的主要是“转述”和“亲见”的区分。在“转述”史料的链条上,形成两个并行的线索:周海婴—贺圣谟—罗稷南;周海婴—陈焜—罗稷南。“毛罗对话”的信息源头是罗稷南,贺圣谟、陈焜是第一次转述者,周海婴是第二次转述者,证据链条中任何一个环节发生问题,都会影响信息的可靠性。贺圣谟和陈焜都是时隔多年后,全凭记忆“转述”罗稷南当年告知的内容,在具体陈述层面有所差异,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周海婴的“转述”存在几处错误,说明周海婴记忆选择的原始性,没有“精致”地搞成“合理”的表述。贺圣谟和陈焜站出来,从基本事实层面支持了周海婴的“转述”。三人“转述”存在着表述的差异,但似乎并不影响他们所指的基本事实。黄宗英的“亲聆”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也赢得了更多学者的信任。有学者表示相信“毛罗对话”的真实性,理由有三:一是新华社当年的报道,二是陈焜、贺圣谟与黄宗英可以相互印证,三是毛泽东就曾三次回答过“倘若鲁迅活着,敢不敢写”的问题^[14]。

“对历史说来,文献不再是一种无生气的材料,即:历史试图通过它重建前人所作所言、重建过去所发生而如今留下印记的事情。”^[15]面对“毛罗对话”这一孤证,参与讨论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将其放置到当代历史话语中,用不同的方式和态度激活这段史料的历史价值,从最初对“毛罗对话”史实的真伪之辩、有无之争,逐渐进入对“毛罗对话”可能性的逻辑推断和历史价值的估定。

学术界对“毛罗对话”的考辩,基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文献史料排列法,一种是历史逻辑判断法。陈晋挖掘、排列诸多《毛泽东选集》《文汇报》等体制性文献史料,说明座谈会并没有提到“鲁迅活着会怎样?”的问题,他的猜想指向罗稷南,指向“毛罗对话”信息源,也指向贺圣谟、陈焜、周海婴“误传”。^[15]陈晋“用‘编史’中的资料去考证‘实史’中的事实,但孰料编史中根本没有编入这个曾经发生的事实,所以,他无论如何不会在考证中有确定的结论得出”^[16]。陈晋所引述的文献史料,基本为已经公开出版的体制性图书和报纸,证据具有同质性、同源性,属于“文献的一致性和同质的资料体”。根据这些经过严格审核、筛选的文献史料没有提到“毛罗对话”,就断定“毛罗对话”不存在,未免失之于偏。秋石“自2003年1月22日……进行了长达14年之久持续不懈的源头寻踪调查考证,获得了大量有益的史料史实,从而为这个众说纷纭引发社会震荡的‘毛罗对话’,在一定程度上还了历史本原”^[17]。他用系列论文提出了八个问题,对跨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进行简单地文字比对,而没有对产生文本的时代语境和作者不同时期的处境、心境进行还原,只是为了证明“黄宗英的这篇3400字的所谓‘亲聆’文章,2700字左右涉嫌造假”,形成完整的“反面”证据链,而缺少对“正面旁面”证据的“博求”。“仅仅用1957年3月毛泽东的讲话去否认四个月毛、罗答问的真实性;或者以海婴先生叙事中存在某些细节出入为由去推断毛、罗对谈之不可信;这种方法却未免过于简单。”^{[18]40}

许多学者都主张重返历史语境,用历史逻辑考辩“毛罗对话”的真实性。尹学初、谢泳、黄金生通过分析毛泽东在20世纪50-70年代关于鲁迅的讲话,认为“毛泽东的鲁迅观不但丝毫没有改观,而对鲁迅的评价之高,推崇之烈,却有增无减,只是表达的角度和侧面与过去有所不同罢了”,毛泽东的鲁迅观是稳定的、一贯的^[19-20]。黄修己、朱正、严家炎等侧重分

析毛泽东鲁迅观的矛盾性、断裂性,并将“断裂点”定位于1957年6月8日。他们认为,不仅1957年毛泽东涉及鲁迅的讲话、谈话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而且,毛泽东的鲁迅观在整体性层面,也出现断裂,“毛罗对话”就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其历史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都很高^[21-23]。也有的学者主张在这个问题上要慎重,强调指出,“披露领袖言论是一件郑重的事情。同时,对领袖人物的著作和言论应当全面分析,防止用情绪来支配观点。对于评价鲁迅而言,毛泽东公开发表的言论跟非公开发表的言论,一贯的评价跟个别的提法,庄重的提法跟随意的说法,绝不具有同样的意义和价值。这恐怕也应该成为‘史料学’的一条原理”^[24]。由于当代文献史料,特别是涉及最高领导人讲话、文稿的复杂性,又引发了关于毛泽东讲话、文稿与正式出版物之间的差异性,毛泽东所有谈话、讲话的现场记录问题,领导人公开出版的讲话与“非正式谈话”之间的关系问题,领袖人物公开发表的言论与非公开发表的言论的关系问题,等等。作为领袖人物公开发表的谈话和非公开发表的谈话,当然会有所区别,但是否公开发表不能以官方出版物为准,若“毛罗对话”发生在公开场合,而不是私人场合,已经在现场“正式发表了”。从史料的意义和价值角度而言,“公开发表的言论”与“非公开发表的言论”,这是比较表象的,史料对历史的影响及其深度与广度,才是区分史料意义和价值的关键性尺度。

在历史长河中,变与不变是相对的,它始终处于辩证的矛盾之中。不变体现了历史的传承,变则体现了历史的革新。从史料层面考察,在不变为主流的历史时段,承接性史料更为集中,历史价值相对凸显;而在变为主流的历史时段,断裂性史料则更引人注目,历史价值更为显在。变与不变共处于各个历史阶段,呈现历史的曲折性与复杂性,承接性史料与断裂性史料也有共性特征,只不过有显与隐、主与次

的区分。对之,我们既不能用同质性的承接性史料证据链覆盖断裂性史料,也不能用断裂性证据链解构承接性史料的存在价值,需要综合考虑变与不变之间的关系,辩证把握同一条史料中所蕴含的变与不变的具体内涵。当然,面对1957年这个特殊的年份,立足于变来观照历史,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在看到变的同时,也要看到变背后的不变,才能得出深刻性洞见,将其讨论引向深入。就此而言,朱正、严家炎等立足于毛泽东的鲁迅论的变,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毛泽东一贯从政治家的立场谈论鲁迅,具有不变的特征,表现出解析史料的清醒和辩证。

由周海婴“转述”的“毛罗对话”,引发了一场长达十余年的学术争论,尚未形成定说,而且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难以形成定说,很有可能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一桩“悬案”,其关键在于没有找到“毛罗对话”的直接记录,也就是原始性的“第一手史料”,只能依靠“转述”材料揣摩历史真相。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使“毛罗对话”真实存在,罗稷南先生也不敢、不愿、不能记录下来,只能记录在脑海中,并告诸于后辈,希望有朝一日能“大白于天下”。而几十年过去后,“转述”者和“亲聆者”不免都存在记忆误差,表述不够统一,甚至有较大出入,实属正常。在讨论中,争论各方所拿出的史料重叠程度很高,但却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一方面说明专家学者们在历史意识层面各持己见,另一方面也暴露出甄别、辨析、运用当代文学史料方面,存在着“人执一说”的主观性,当代文学研究尚没有形成具有共识基础的史料规范,难以达成具有包容精神的学术判断,更遑论“臆举多数之异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192]。

三

当代文学研究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的最大不同,就在于现场感。这种现场感,使当代文学史料在毕呈活态特性的同时,也给她稳定性带来一定

的影响,甚至由此及彼,有可能对其史料的重要性产生不应有的忽略。常常是人在事中,或限于认知和条件,当事人并没有意识到当时所做的事、所说的话具有的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加之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时间变迁,回忆者常常陷入孤独的喃喃自语,导致诸多重要的史料成为孤证。何启治有关《古船》出版后遭遇的叙述,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古船》在《当代》全文刊发后,曾在当时文坛引起了较大反响。1986年年底,山东省委宣传部和《当代》编辑部等,分别在济南、北京召开研讨会给予较高评价。两次研讨会,“绝大多数论者对《古船》倍加赞赏”,但“来自当时某些领导者的口头而未见诸文字的批评,以致当时的社长、主编虽然并未看过作品,却指示我不要公开报道《古船》讨论会”。何启治是多年以后回忆当时的情况,也有《当代》发表报道佐证史料。但是,最为关键的史料即“来自某些领导者的口头而未见诸文字的批评”,却始终没有记录佐证^{[25][768-773]}。所以,尽管他的这一回忆很重要,并且我们相信是真实的,但是从史料学角度来衡量,恐怕只能算作是孤证。至少在没有找到当事人领导的“口头指示”证据之前,是如此。

当代文学史料的孤证与孤证的当代文学史料,不仅表现为史料的唯一性或孤立性,还表现为史料来源的孤立性或单一性。虽然根据这单一来源的史料复制了诸多版本的史料,但其孤证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洪子诚在《问题与方法》中谈到“白洋淀诗群”的史料属于孤证的问题,他说:“都是孤证,找不到别的旁证或材料来印证、检验它们的真实情况。我和刘登翰编写《中国当代新诗》写到这一诗群,使用的材料也是这样……在实证的意义,上使用材料的方式存在欠缺和漏洞。这会使我们的研究发生困难。”^{[26][28]}洪子诚提到的孤证就是1985年老木编选的《新诗潮诗集》。李杨发现多多的“白洋淀诗歌”,在1988年出版的《行礼》与1989年出版的《里

程》中,这些“白洋淀诗歌”又有了新的改动^[27]。李润霞曾在文章提到《今天》文学社的《里程》(1972-1988)的油印本^[28]。多多热衷于修改自己的诗歌作品,宋海泉的《白洋淀琐忆》有明确记述,荷兰学者柯雷也发现多多的《里程》和《行礼》“两种版本很不一样”。这些不同版本的“白洋淀诗歌”是由多多本人提供的,其最早的“底本”大约来自1985年的《新诗潮诗集》。李杨在大量有关“白洋淀诗歌”的回忆文章、赵一凡留下的材料和80年代以前诗歌刊物中,都没有找到这些重要的“白洋淀诗歌”,无法确认这些作品的创作时间的真假。^[27]像多多的“白洋淀诗歌”这种来源相对集中的孤证材料,理运用考据辨伪的方法进行历史还原,但由于各种条件限制,这些作品的写作时间,只有作者最清楚(也许作者多多也记不清楚了),只能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既不能完全否认其作为当代文学史料的价值,也不能完全肯定其史料价值,只能让它保持孤独存在的现状,历史总有一天会明白的。

程光炜通过对比分析路遥初恋时期的两条对立的孤证,得出一个文学史结论^[29]。“1971年春,延川县有一个到铜川二号信箱工厂的招工指标,路遥和他初恋女友林虹都报了名,林虹体检不合格,路遥出于爱情,把自己这个机会给了她。”这个史料的最早出于路遥和曹谷溪,曹谷溪在《关于路遥的谈话》中夹叙夹议地道出了这个信息。鉴于曹谷溪与路遥在延川时期的特殊关系,许多引述者选择无条件地信任这条史料,包括李建军编的《路遥十五年祭》、马一夫等主编的《路遥纪念集》、王刚的《路遥年谱》等均录入或引述了这条史料。多年来,从事路遥研究的学者没有进行过探究,这条孤证似乎也成了文学史的定论。程光炜介绍了另一条孤证:“当事人……在当年到延川县插队的北京知青‘微信群’里证实:自己1971年春到铜川二号信箱工厂当工人的招工指标,并非路遥让给她的……自己是通过面试才获得这个

机会的。”这一条史料同样是孤证,能够说明这条孤证的只有结果:林虹确实得到了广播员的工作。显然,相比于曹谷溪的孤证进入年谱等正式文本,林虹仅仅在微信圈里的证实相对无力很多,史料形态也不规范。路遥名气越来越大,文学史地位越来越稳定,林虹却一直默默无闻,几乎没有见到她谈论当年与路遥初恋的文字记载,突然在微信圈里说出了这番话,也令人浮想联翩。如何对待这两条信息矛盾的孤证,程光炜所得出的文学史结论是:“一些文学史上的孤证需要谨慎对待,一份沉埋的孤证与文学史结论的阐释性的关系更需要认真处理。当前一份孤证因为沉默沉埋时间过久,已经损害文学史结论的可靠性,在后一种孤证出现后,这种固化问题被解除了。文学史结论又开始踏上新征程。”

四

“毛罗对话”、“关于《古船》的指示”、多多的“白洋淀诗歌”与路遥转让工作名额事件,都是文学史的孤证。这些孤证或者身份不明,或者缺乏坚实史实支撑,或者时间不实,或者相互矛盾,甚至不排除人为制造的嫌疑,都有待于进一步考辨和确认,需要挖掘更多的证据来丰富相关的证据链。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孤证在文学史均有其或大或小的意义,因为是孤证,其史料价值也不可替代。这就告诉我们:当代文学史料的孤证之所以孤,是因为所涉及的史实尚没有露出“水面”,它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而坚实地支撑史实的存在。然而,孤证作为冰山一角,毕竟将“冰山”隐隐约约地显露出来,撕开了遮蔽史实的一道缝,具有潜在的价值。对于孤证,一定会存在真与假的判断,无论证实还是证伪,都是一种拨开历史迷雾的艰苦工作。证实透过这一孤证,给还原历史史实以有力的启迪或深刻的暗示,循着孤证线索,深挖开去,建立完整的证据链。证伪也能激发人们钩沉历史真相的兴趣,在寻找历史史实的路上,开辟出另一番学术天地,进而还原历史真实。一条孤证引发证实与证伪的学术讨论,将被埋

没的史实钩沉出来,就是孤证的独特价值。因此,当孤证尚孤之时,一定要给予足够的尊重和宽容,不能用简单的真假判断,将孤证封杀在摇篮里。一个成熟的学科、一名成熟的学者、乃至一个成熟的时代,应该能够容纳孤证的存在,扶持孤证的成长,从这一片叶子、一条纹路出发,寻找历史的本真。所以,对待孤证,既要坚持“孤证不立”“孤证不举”的学术规范,也要考虑当代文学现场感的影响,采取“孤证不废”的策略,走出一条符合当代文学研究实际的史料学之路。

(本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得到浙江大学吴秀明教授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 [1]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要[M].上海:东方出版社,2012.
- [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台北:里仁书局,1981.
- [4]吴秀明.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 [5]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6]沈敏特.孤证、考证与不必考证——评“鲁迅活着会怎样”[J].同舟共进,2003(1):17-19.
- [7]陈明远.综述:1957年毛罗对话的论辩[J].社会科学论坛,2004(2):81-86.
- [8]周海婴.鲁迅与我70年[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1.
- [9]贺圣谟.“孤证”提供人的发言[N].南方周末,2002-12-05.
- [10]李浙杭.关于毛泽东和罗稷南的对话[M]//宁波当代作家散文选:下.宁波:宁波出版社,2006:177-181.
- [11]陈焜.就毛主席答罗稷南问致周海婴先生的一封信[J].北京观察,2002(3):47-49.
- [12]黄宗英.往事: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N].南方周末,2002-12-05.

- [13]黄宗英.“鲁迅活着会怎样”——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N].文汇读书周报,2002-12-06.
- [14]张健.1957年“毛罗对话”版本比较及解读[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6):88-95,127.
- [15]陈晋.“鲁迅活着会怎样”?——罗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泽东“秘密对话”质疑[J].百年潮,2002(9):62-88,70.
- [16]张学义.《鲁迅与我七十年》读后漫笔“姑存之”与“渐信之”[J].教书育人,2004(2):58-59.
- [17]秋石.黄宗英“亲聆”“毛罗对话”历史真相调查[J].粤海风,2017(3):20-31.
- [18]尹学初.“毛罗对话”之我见[J].杂文随笔,2003(12):99-101.
- [19]谢泳.对“鲁迅如果活着会如何”的理解[J].文史精华,2002(6):57-60.
- [20]黄金生.“我是圣人的学生”毛泽东和鲁迅[J].国家人文历史,2016(6):82-89.
- [21]黄修己.披露“毛罗对话”史实的启示[J].文艺争鸣,2003(2):12-14.
- [22]朱正.“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J].文化广角,2003(12):14-20.
- [23]严家炎.史余漫笔[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44.
- [24]陈漱渝.关于所谓“毛罗对话”的公开信[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3):46-48.
- [25]何启治.世纪书话——我和当代优秀长篇小说的遇合机缘[M]/宋应离,刘小敏,编.亲历新中国出版六十年.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 [26]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讲稿[M].增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 [27]李杨.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从陈思和主编的《当代文学史教程》谈起[J].文学评论,2000(3):52-62.
- [28]李润霞.颓废的纪念与青春的薄奠——论多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诗歌创作[J].江汉论坛,2008(12):103-106.
- [29]程光炜.一份沉埋的孤证与文学史结论——关于路遥1971年春的招工问题[J].当代文坛,2019(2):41-44.

The Attitude, Method and Value of "Uncorroborated Evidence"

Nan Zhigang

Abstract: “Uncorroborated evidence being unacceptable” has been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in the modern academia. However, historical materials supporting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hav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The “Mao-Luo-argument”, the “instruction regarding the Ancient Boat”, the “poems of Baiyang Lake” from Duo Duo, and the issue of “Yao Lu transferring his work appointment”, are all the uncorroborated evidences existing alo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vertheless, these evidences showed their irreplaceable values for the studies related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y revealing the tips of iceberg and breaking the predicaments where misty historical facts seem impossible to be unpuzzled. They are the first levers of the historical truths. The worth of an uncorroborated evidence lies in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between testification and falsification raised by this exact evidence, and the subsequent disclosure of the previously covered historical fact. If being testified, the uncorroborated evidence could provide us with great enlightenments and a possibility to establish a complete chain of evidences; if being falsified, it would motivate people to learn more about historical facts, and opening up a whole new research area. The research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hould confront uncorroborated evidences and give enough respect as well as liberality, while avoid obliterating uncorroborated evidences just out of simple judgments. To deal with uncorroborated evidences, we certainly need to stick to the research rules like “uncorroborated evidence is unacceptable”. And we also need to take its value into our consideration, admitting its merit and using it strategically. This will help us developing suitable attitude and method toward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regard of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research; historical material; uncorroborated evidence; attitude; value